



中华思想经典

弘明集

【梁】僧 祐 编撰

刘立夫 胡勇 译注

中华书局

中华思想经典

弘明集

【梁】僧 祐 编撰

刘立夫 胡勇 译注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弘明集 / (南朝梁)僧祐编撰; 刘立夫, 胡勇译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1
(中华思想经典)

ISBN 978 - 7 - 101 - 07680 - 6

I. 弘… II. ①僧…②刘…③胡… III. ①佛教史
— 中国 — 古代②弘明集 — 译文③弘明集 — 注释
IV. B94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21684 号

书 名 弘明集

编 撰 者 [梁]僧 祐

译 注 者 刘立夫 胡 勇

丛 书 名 中华思想经典

责任编辑 王水涣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1 $\frac{1}{2}$ 插页 2 字数 234 千字

印 数 1-8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7680 - 6

定 价 21.00 元

前言

《弘明集》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部护法弘教的文献汇编，作者系南朝梁武帝时期的僧祐。此书的编撰，意在回应当时社会上各种怀疑、讥讽、批评甚至废毁佛教的言行和思想，释疑解难，弘扬佛教，正如僧祐在序文中所说：“夫道以人弘，教以文明，弘道明教，故谓之《弘明集》。”

今本《弘明集》共14卷，约14万字，收录了自东汉至南朝齐、梁时代五百年间教内外人士护法御侮、弘道明教及其与之相关的论文、书信、诏令、奏表、檄魔等各类文论共185篇，其中东汉2篇，东晋47篇，刘宋39篇，南齐15篇，姚秦10篇，梁朝73篇，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此一时期佛教的基本教义、传播状况以及佛教与儒家、道教等本土思潮的相互关系。涉及作者共123人，其中僧人19人，其余多为王公大臣和文人学士。由于作者多为帝王重臣、社会精英和高僧大德，《弘明集》不仅汇集了早期中国佛教史的一批珍贵文献，也无意中保存了一些重要的社会名流之作。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云：“然六代遗编，流传最古，梁以前名流著作，今无专集行世者，颇赖以存。”因此，《弘明集》就不仅仅具有为佛教辩护的意义，在哲学、宗教学、文学、史学等方面同样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

在阅读本书之前，有必要介绍《弘明集》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其主要思想内容。

佛教约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据载，佛教传入中国有两种典型的说法。一说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支王使伊存口授《浮屠



经》。一说东汉明帝永平年间(58—77),皇帝夜梦神人,身有日光,飞入殿前,帝意欣然,甚悦之。明日问群臣,解梦之臣奏曰:此神即是天竺之佛陀也。帝乃遣使者张騫、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人发西域,抄回《四十二章经》,藏于皇家图书馆之兰台石室,并兴建佛寺,于是佛道兴焉。无论哪一种说法,都表明佛教是一种和平的宗教,是中国皇帝“请进来”的。然而,这绝不意味着佛教在中国总是一帆风顺,没有任何阻力和挫折。实际上,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决不是风平浪静的,怀疑、批评、讥讽甚至暴力打击时有所闻。因此,佛教必须作出适应性的调整,通过教理、教规上的改造和学理上的辩论等办法来应付这种局面。这种状况在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一直存在,而以佛教在中土最初传播和发展的五百年间尤为突出。

佛教传入时,中国已经是一个政治、经济和文化高度发达的封建国家。中国自秦代起,就建立起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大帝国。汉代的中國已形成高度发达的物质与精神文明,处于当时世界文明的前列地位。中国的学术思想经过了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已经形成了比较定型的文化形态。到西汉中期,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融儒、法、阴阳五行、黄老刑名之学说于一体,建立名为“儒术”的经学统治。这是政治上的大一统在意识形态中的体现。从此,儒家学说始终保持了它的官方哲学地位,成为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的主导形态。儒学重视人伦日用、关注现实,这一传统成为抵制本土宗教发达的重大力量,同时也对外来的宗教具有强大的免疫力和制约力。

在佛教传入以前,中国还没有发展出定型的本土化宗教。秦

汉以前，流行的是祖先崇拜、先王崇拜、神仙方术、鬼神观念、卜筮星占等较为原始的多神信仰。直到东汉顺帝（126—144在位）时，才由道家思想、神仙方术、阴阳五行、民间巫术等多种因素相结合，发展出早期的道教。佛教的传入，对道教的发展有很大的刺激和启发作用。佛道两教在中国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并行发展的，但是，以本土宗教自居的道教对外来的佛教有着本能的拒斥意识。

佛教初传中国的时候，影响极为微弱，史书上只能见到零星的记载。汉代谶纬迷信盛行，社会上充斥着大量的迷信方术，佛教便与“黄老”一类的神仙方术混合在一起，人们误以为它就是“斋戒祭祀”之类的方术。当时来华的印度高僧安世高和支娄迦谶等人，也有意将佛教的“禅法”介绍进来，并突出神秘的“禅观”，与道家神仙说教合拍。东汉末年潜居交趾（治所在今广西梧州）修道的牟子作《理惑论》，向人们介绍佛时说：“佛者，谥号也，犹名三皇神、五帝圣也。佛乃道德之元祖，神明之宗绪。佛之言觉也。恍惚变化，分身散体，或存或亡，能小能大，能圆能方，能老能少，能隐能彰，蹈火不烧，履刃不伤，在污不染，在祸无殃，欲行则飞，坐则扬光，故号为佛也。”（《弘明集》卷一）将佛陀类比儒家的道德圣人和道家的神仙，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佛教的一知半解。

佛教在中土产生较大影响是从东晋十六国开始的。西晋灭亡后，以司马睿为首的皇室和门阀士族南渡长江，在江南建立了偏安一隅的东晋王朝，北部中国则陷于十六国的纷乱之中，社会的苦难加快了佛教的传播和发展。当时南北两地的佛教发展都很快，佛教领袖则受到尊崇。在北方，统治者因胡人出身，感到名位不正，企图借助佛这一“戒神”来加强统治力量。如后赵石勒、石虎父子信任神僧佛图澄，佛教几乎成了后赵的精神支柱。前秦苻坚曾征集道安等名僧数千人于长安，大弘佛法。后秦姚兴儒佛并重，迎鸠摩罗什到长安，一时名僧辈出，其州郡事佛者，十室而九。在南方，



东晋的世家大族多支持佛教，其中的王导、王敦、庾亮、谢安、谢石、郗超、谢琨、桓彝、周嵩、王恭等，都与名僧密切交往。王导之子王治、王珣、王珣，其孙王谧，以及著名文人如许珣、戴逵、王羲之、顾恺之、谢灵运、孙绰等，都曾向当时高僧问学或执弟子礼。东晋以后，在约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南方经历了宋、齐、梁、陈四代，史称“南朝”；北方则有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等数朝相继，史称“北朝”。佛教在南北朝时期继续获得上层统治集团的支持而迅速发展壮大起来。当时的统治者之所以支持佛教的发展，是他们认识到佛教可以弥补世俗政治的不足。南朝宋文帝统治集团曾对此进行过讨论。大臣范泰、谢灵运常说：

“六典经文，本在济俗为治耳。必求性灵真奥，岂得不以佛经为指南耶！”宋文帝同意说：“若使率土之滨，皆纯此化，则吾坐致太平，夫复何事！”大臣何尚之补充说，佛教可以隐恶扬善，国家只要有十分之一的人信佛，就可以带动天下的人心向善，皇帝便可以“坐享太平”了。（《弘明集》卷十一《答宋文皇帝赞扬佛教事》）这种评价虽然有些夸张，但佛教在当时的正面作用还是不可低估的。

然而，伴随着佛教的迅速发展，一个前所未有的社会新阶层，即僧侣阶层在中土崛起，佛教的社会负面作用也日益凸现出来。西晋以前，佛教基本上是自由传播，政府不加多少限制，汉人出家的极少。东晋十六国以来，政府自觉地支持佛教的发展，给予出家人诸如免税、免役等便利和特权，汉人沙门迅速猥杂膨胀起来。据唐法琳《辩正论》卷三载，东晋一百余年，建寺达一千七百多所，宋、齐、梁、陈四代有增无减。北方更甚。据《魏书·释老志》记载，北魏承明元年（476）全国有寺庙六千多

所，僧尼七万多人，至延昌二年（518）寺数增加到一万二千多所，到兴和二年（540）寺庙发展到三万所，僧尼二百多万人。即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寺庙增加了3倍多，僧尼增加了近30倍。佛教将佛、法、僧看成“三宝”，而寺庙和僧人则是佛教兴衰的一大标志。但寺院要维持正常运转，就要接受施舍捐赠、经营土地以至商业、高利贷等，于是便形成了寺院经济。寺院的僧众奉释迦牟尼为最高教主，以“释”为姓，自称“方外”、“释子”，离弃父母家室，标榜“不敬王者”，却又必须依靠人间的“烟火”才能生存。值得指出的是，当时那么多人出家，并非人人都信仰佛教，民众多是为逃避封建压迫和剥削才遁入空门的，这就造成了沙门的泛滥成灾。如后赵时，“中州胡晋，略皆奉佛”，“澄（佛图澄）道化既行，民多奉佛，皆营造寺庙，相竞出家。真伪混淆，多生愆过”（《高僧传》卷九《佛图澄传》）。东晋义熙年间，江左有袁、何二贤依傍韩非《五蠹》篇，喻沙门为“五横”之一，认为沙门既然高尚其志，当德行卓然，为物轨则，不能营求无息，与民争利；沙门的行为已经“无益于时政，有损于治道”了，应该废除之。（《弘明集》卷六《释驳论》）

这样，中国封建社会便形成了一系列新矛盾——朝廷与教团、名教与佛法、世俗地主与僧侣地主、僧侣与农民之间的矛盾。从东晋十六国以后，伴随着佛教的发展，这些矛盾也就日益暴露、激化了。北方统治者崇尚武力，当他们看到出家人口的与日俱增，严重地影响了封建国家的劳动力和赋税收入，出现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的时候，就有可能采取极端措施，拆除寺庙，驱赶、甚至杀戮沙门，迫使其还俗。北朝的两次佛教“法难”就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在南方，统治者则比较理智，力图将寺庙、教徒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并通过学术思想上的自由辩论来沟通和解决佛教与社会各方面的矛盾。

佛教毕竟是外来的宗教，它的教义、仪轨、制度多不符合中国固有的文



化传统，特别是与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政治伦理和思维方式颇多隔阂。且不说沙门、沙弥尼之类的戒律在中土亘古未有，而落发辞家、行乞和居更为中土社会所不容，与儒家的孝亲观念极为不符。儒家政治伦理强调忠孝两大德行，而佛教沙门的辞亲出家、不敬王者、不尊俗礼被视为佛教最大的“不忠不孝”。佛教相信“业力”轮回、因果报应，相信精神不灭，这种教义对中国人来说也有些惊世骇俗。所有这些问题在佛教传人之初就被注意到了，随着佛教的发展，特别是到了东晋十六国以后，佛教已成为一大社会问题，这些潜在的因素就日益显露出来。这些问题在魏晋南北朝特别是在政治环境相对宽松、学术思想相对自由的南方王朝曾引起了一次又一次的讨论和争辩，三教之间掀起了多次争论的高潮。

需要提及的是，道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也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佛教的竞争对手。道教无论在教义、教规、经典、组织制度上都与佛教差别甚大，二教为争夺宗教利益和生存空间进行了长期的斗争。早在东汉时期，就有老子西入夷狄为浮屠的传说，继而增益为老子西游成佛，化佛陀为其弟子的故事，后来演变成《老子化胡经》。《老子化胡经》在南北朝时期一直比较流行，佛道之间为此曾展开了激烈的“夷夏之辨”。道教在与佛教的斗争中，极力拉拢儒家，而佛教也针锋相对，尽力调和儒佛矛盾，对道教的弱点和隐私尽力揭露，儒、佛、道三教的矛盾和斗争也变得复杂起来。

南朝梁代，扬州建初寺沙门僧祐从“弘道明教”的角度，将五百余年来佛教同中国文化的碰撞、冲突和交融的历史以文献汇编的形式记录下来，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弘明集》。作为

中国佛教史上第一部护法著作,《弘明集》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汉代以来特别是东晋至南北朝时期的佛教信徒,包括出家的沙门和在家的居士,同固守儒家文化传统和封建国家政治经济利益的封建士大夫、坚持本土宗教信仰的道教信徒以及社会上的各种对佛教怀有歧视和敌对情绪的人们的论争、辩驳和斗争的历史状况,也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此一时期佛教的基本教义、发展水平、流播状况,从而比较全面地再现了佛教在中土最初五百年的沧桑历程。

就《弘明集》的思想内容而言,僧祐在《后序》中曾提出“六疑”,即《弘明集》是围绕六大问题而展开的。这六大问题是:“一疑经说迂诞,大而无征;二疑人死神灭,无有三世;三疑莫见真佛,无益国治;四疑古无法教,近出汉世;五疑教在戎方,化非华俗;六疑汉魏法微,晋代始盛。”用现在的话来说,“六疑”的大意是这样的:第一疑是世人怀疑佛经上讲的道理过于神奇荒诞,没法用事实验证。这里是指古代印度与中国传统世界观和思维方式的差异。第二疑是世人怀疑神灵不灭和三世报应说。第三疑是世人认为佛教于国于民无补,并非佛教所宣扬的那样神力无边。这大致是指佛教对封建政治、经济和伦理方面的危害。第四疑和第六疑是怀疑佛教在中国的历史不长,不是古来就有的圣人之教,而且有兴有衰。中国古人持退化史观,相信古胜于今,今不如昔,也就是认为佛教历史不古,所谓的“三世十方佛”不合“圣人”的古训。第五疑指斥佛教是夷狄之教,只适合于落后愚昧的人群,不堪与华夏文明争锋,当然不适用于中国。这是讲夷夏之辨。僧祐讲的“六疑”在南北朝颜之推的《颜氏家训》里也可以见到类似的见解,可见这些问题是整个汉魏两晋南北朝的时代问题,也是佛教必须回答的问题。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儒佛道三教论争是《弘明集》涉及最多的问题,许多文章常常提及“周孔与佛”或“孔老与佛”,其中的周孔就代表儒家,孔



老代表儒、道二教，佛即代表佛教。以此而言，《弘明集》也就是一部以佛教为主体的反映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三教关系的文集。从三教关系的角度看，三教论争也就是佛教与儒家和道教的论争，是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之间的斗争。这种斗争是温和的思想辩论，而不是宗教战争，这是中国本土文化排斥或融受外来文化的一种特殊形式。双方争论的问题很多，有哲学世界观的分歧，有宗教派别之间的意气之争，有政治伦理的争端，也有经济社会方面的利害冲突。比较突出的有三大方面：

一 因果报应和形神之争

这是哲学世界观和宗教世界观最根本的争论。《弘明集》的卷一、卷二、卷三、卷四、卷五、卷九、卷十等都与此有关。因果报应是佛教的基本教义之一，同中国传统的世界观和宗教观存在很大差距，受到许多中土人士的怀疑和批评，认为它不符合“周孔之教”，或者老庄之道。这个问题在晋宋之际争论十分激烈。发展到后来，则被形神之争所取代。报应之争和形神问题两者本来是相互联系的，本质上属于同一个问题，争论中常常连在一起。但是，因为因果报应是否成立，最根本的理论前提则是神灭与神不灭，这样，形神问题便成为佛教因果报应是否“合理”的关键。要反对佛教，也就是要反对神不灭，坚持神灭论；要维护佛教，也就是要反对神灭，坚持神不灭论。这个问题在齐梁之际达到争论的高峰。本书选取了《弘明集》所录慧远的《明报应论》、《三报论》，何承天的《达性论》，颜延之的《释〈达性论〉》，桓谭的《新论·形神》，宗炳的《明佛论》，萧琛的《难神灭论》，曹思文的《难神灭论》，范缜的《答曹录事〈难神灭论〉》，慧远《沙门不敬王者论》中之第五篇《形尽神不灭》，

梁武帝的《敕答臣下神灭论》。

二 夷夏之辨与佛道斗争

这是本土的道教与外来的佛教之间的论争，反了佛教与道教在宗教主张以及政治、经济利益上的矛盾。《弘明集》卷一、卷二、卷七、卷八等有关文章反映了这一状况。佛道之争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夷夏之辨，这是道教利用本土文化的优势压制外来佛教的一种策略。发展到后来，双方在教义、教规上的优劣以及对封建国家的利弊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和辩驳。本书选取了《弘明集》所录谢镇之的《与顾道士书》、朱昭之的《难顾道士〈夷夏论〉》、刘勰的《灭惑论》。

三 沙门与王权之争

这是佛教与封建政治、经济、伦理等方面冲突的一个集中表现。《弘明集》的卷一、卷五、卷十一、卷十二等，都与此有关。佛教是印度社会和文化的产物，它要最终为中国社会所接纳，就必须适应中国的国情。中国封建政治的重要特征就是大一统与王权至上，佛教的教团组织是不可能像它在印度那样独立于王权之外的。所以，僧人当初见皇帝可以不下跪，只是汉魏之际皇帝给予少数外国僧人的外交特权，随着中国本土僧人的增加，出现了一个独立于王权之外的社会集团，问题的性质就不一样了。沙门是否礼敬王者，东晋王朝为此曾发生了两次大规模的争论，虽然因门阀贵族之间的权力平衡的需要，最后君主妥协，但问题并没有解决。当然，这个问题是迟早要解决的。本书选取了《弘明集》所录何充的《奏沙门不应尽敬》、庾冰的《代晋成帝沙门不应尽敬诏》、慧远的《沙门不敬王者论》。

除了三教论争以外，《弘明集》中还收集一些宣传佛教的文论，如牟子的《牟子理惑论》、孙绰的《喻道论》，本书也加以选录。通过译注上述重要篇目，《弘明集》的基本内容已呈现出来。相信读者在阅读之后，对《弘明集》这一重要的古代经典会有基本的了解。



本书的译注原文共23篇，这23篇文章都是《弘明集》中的名篇，所采用的版本以《大正藏》本为底本、以金陵刻经处本为校本，其中篇名全部采用金陵刻经处本的标题，因为它比较简洁，在中国学术界几乎约定俗成了。最后，还要谈一下本书的译注原则。《弘明集》是一个文献汇集，每位文章作者的思想、文字风格以及所处时代的语言习惯都有不同，更重要的是其中涉及的儒、释、道三家的名词义理，特别是大量历史典故的灵活使用，都增加了翻译的难度。为了尽可能保证翻译的准确性，全书采用直译的方法，一一对应，逐字逐句地翻译，尽量避免出现意译所带来的过度诠释问题。对于一些特定名词的翻译，既考虑到保持它在历史语境中的原义，又要照顾到其在当下语境中的意义，另外，鉴于所选的多是论辩性文字，所以在翻译的时候，尽可能地保留了原文的句式和语气。本书的翻译追求“信”这一目标，注译时尽量满足以下三个原则：一是文中出现的重要人物、核心概念、典故引文以及难解字词都给出注释；二是注释时采取注明出处和简单解释的注、释结合原则；三是对于重复出现的典故、文词，不做重复注释。当然，无论考虑得多么周全，也不管有多么努力，错误和纰缪都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雅正。

译注者

2010年8月

目录

前言	1
弘明集序	1
牟子理惑论	6
喻道论	72
明报应论	91
三报论	100
达性论	107
释《达性论》	112
新论·形神	116
明佛论	123
难神灭论	202
难神灭论	229
答曹录事《难神灭论》	233
形尽神不灭	243
与顾道士书	250
难顾道士《夷夏论》	258
灭惑论	271
答宋文皇帝赞扬佛教事	294

大梁皇帝敕答臣下神灭论	306
奏沙门不应尽敬	309
代晋成帝沙门不应尽敬诏	312
沙门不敬王者论	316
弘明集后序	333

∴ 弘明集序 ∴

【题解】

本篇载于《弘明集》卷一，是南朝梁代高僧僧祐（445—518）为《弘明集》所作的序言。在序言中僧祐记述自己编撰该书的宗旨：“夫道以人弘，教以文明，弘道明教，故谓之《弘明集》。”并对《弘明集》编撰时选择材料和安排体例的原则予以说明。

夫觉海无涯，慧镜圆照。化妙域中^①，实陶铸于尧舜；理擅系表^②，乃埏埴乎周孔矣^③。然道大信难^④，声高和寡。须弥峻而蓝风起^⑤，宝藏积而怨贼生。昔如来在世，化震大千，犹有四魔蓄忿^⑥，六师怀毒^⑦，况乎像、季^⑧，其可胜哉！

【注释】

①域中：寰宇间，国中。《老子》：“域中有四大，而王处其一焉。”

②系表：言辞之外。《晋春秋》荀粲曰：“立象以尽意，非通乎象外者也；系辞以尽言，非言乎系表者也。象外之意，系表之言，固蕴而不出矣。”

③埏埴（shān zhí）：和泥制作陶器，此处指周公和孔子“制作”了礼仪。埏，用水和泥。埴，黏土。《老子》：“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

④信（shēn）：通“申”。申张；申明。

⑤蓝风：梵语。又名“鞞蓝风”。疾风；暴风。清黄遵宪《锡兰岛卧佛》诗：



“何不气一喷，散为鞞蓝风？”钱仲联笺注：“《大宝积经》：‘此三千大千世界，为毗岚猛风之所吹坏，一切散灭，无有遗余。’玄应《一切经音义》：‘吠蓝婆风，旧经中或作毗岚婆，或作鞞蓝。亦作随蓝，或作旋蓝，皆梵之楚夏耳。此云迅猛风也。’”

⑥四魔：此指佛将成道时，四魔中之一的天子魔，即第六天魔曾率诸眷属来骚扰他，企图干扰、阻挠其证成佛果。

⑦六师：即六师外道，是与释迦牟尼同时代的六个反婆罗门正统思想的代表人物，即：（一）富兰那·迦叶、（二）末迦梨·俱舍梨子、（三）珊夜·毗罗尼子、（四）阿耆多·翅舍钦婆罗、（五）迦罗鸠驮·伽旃延、（六）尼乾陀·若提子。

⑧像、季：佛教分佛法之传布为正、像、末三时，像季即第二时之末期。

【译文】

觉悟之路像大海一样无边无际，智慧之光如明镜一般普照世界。玄妙的教化，实陶冶于尧舜之治；礼仪之兴盛，乃肇端于周孔之教。然而，曲调越高雅，能唱和的人就越少，道越精深宏大，越难得到申张。须弥山因崇高峻伟而常有迅猛之风生起，一个人若金银财宝积聚太多就会招来他人嫉妒甚至盗贼。过去释迦牟尼佛在世时，他的教化泽润天下，却仍有四魔一再去骚扰他，六师也经常诽谤他，何况现在正值像法时代的晚期，诋毁和攻击佛法的人该是很多啊！

自大法东流，岁几五百。缘各信否，运亦崇替。正见者敷赞，邪惑者谤讪。至于守文曲儒，则距为异教；巧言左道，则引为同法。距有拔本之迷，引有朱紫之乱^①，遂令诡